

“加齐起源说”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

韩志斌 姜欣宇

内容提要 学术界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的历史阐释尚未达成共识。维特克在质疑奥斯曼帝国“部落起源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齐起源说”的解释架构,即认为奥斯曼帝国起源于一个“边疆社会”中的“加齐团体”。奥斯曼早期国家在地理上位于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区域,占领这里极为困难,“加齐战争”得以长期延续,因而最终形成帝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加齐起源说”的诠释路径进行批判和否定。“加齐起源说”反映了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的某一维度与思考命题的不同层面。13世纪末的比提尼亚地区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多文明杂糅的地缘政治特征,诞生于此的奥斯曼早期国家亦具有这种多元文化特性,这种特性有助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在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并最终在15世纪形成横跨亚欧的世界性帝国。

关键词 维特克 加齐起源说 奥斯曼 早期国家 部落理论

欧美和土耳其学术界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①问题的研究已经过了长期论争,但尚未达成共识。国内学者涉及该问题时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②正如斯坦福·肖所说: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虽然一直吸引历史专业的学者,但由于缺乏同时期的史料文献,以及后人对这件事的描述相互抵触,因而要做一个权威性的记述很困难^③,另外,奥斯曼人对自身起源的虚构也对该问题的探讨造成了极大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部落社会通史研究”(批准文号: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关于“早期国家”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观点一,克赖生的表述是“介于非政府组织和成熟国家之间的社会形式”,他将早期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或者三个发展阶段:即未完全形成的早期国家(inchoate early state)或者“初始的早期国家”(incipient early state)、典型的早期国家(typical early state)与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transitional early state)(所谓过渡,是指向成熟国家过渡),参见克莱森著,胡磊译《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59页。观点二,以国家本身的构成要素与发展状况来立论的学者,通常将国家划分为“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两大阶段。参见易建平《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和“社会”》,《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2—6页;观点三,早期国家属于古代国家的一种类型,也是古代国家的早期阶段,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古代国家的领土概念每每有“边陲”而无国界,国界只是在所谓“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出现的。参见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5页。本文所说的奥斯曼早期国家指的是正在形成状态中的国家、正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国家,即奥斯曼帝国形成之前的政治形态,属于古代国家的类型。而奥斯曼帝国的形成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1453年,一是1517年。
- ② 国内尚无针对此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涉及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作品主要包括: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奥斯曼帝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涉及此问题的土耳其史作品主要有: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哈全安《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土耳其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管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 ③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年》(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ume I: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mpire, 1280 - 1808*),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页。

困扰。^①戴维森也认为“土耳其民族的早期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相当含糊。有些含糊之处靠神话传说,或是通过添枝加叶地虚构事实而整理成章的。”^②

国内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奥斯曼人起源于中亚地区的一个突厥游牧部落。^③13世纪受蒙古西侵的影响,该部落离开呼罗珊,迁至两河流域的上游。在部落首领苏莱曼死后,其子额尔图格鲁尔率部依附于罗姆素丹国。额尔图格鲁尔死后,在13世纪末,其子奥斯曼创建奥斯曼埃米尔国。^④奥斯曼早期国家是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冲突与交往的产物,动因则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⑤此外,相关作品尤为关注“圣战”在奥斯曼早期国家兴起中的作用,例如,有学者主张“奥斯曼人的国家脱胎于穆斯林在小亚细亚半岛发动的圣战实践,奥斯曼国家的兴起可谓小亚细亚半岛穆斯林圣战实践的逻辑结果”^⑥。

在奥斯曼早期国家建立近百年后(14世纪末),奥斯曼人开始关注自身国家的起源问题。阿赫麦迪(Ahmedi)(1334/1335—1412年)的《伊斯坎德记》(İskendername)是叙述奥斯曼早期历史的诗歌作品。^⑦阿舍克帕夏扎代(Aşıkpaşazade)^⑧等史学家的作品与奥斯曼早期国家历史相关。至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官方认可奥斯曼人起源于乌古思汗的说法,认为奥斯曼君主与乌古思汗是一种历史继承的逻辑关系。

15、16世纪,西方史学家开始收集了有关奥斯曼王室起源和形成的史料与传说,如拜占庭坎塔库泽努斯家族(Contacuzene)后裔西奥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⑨等。17、18世纪,伏尔泰、爱德华·吉本等史家叙述了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简要过程。^⑩

20世纪,学术界开始对奥斯曼早期国家问题进行系统考察。1916年,美国人赫伯特·吉本斯(Herbert Gibbons)认为,奥斯曼人是一个由皈依伊斯兰教的希腊人、巴尔干斯拉夫人与土耳其人混合而成的种族,继承了拜占庭的行政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国家。在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上,吉

① “在奥斯曼人建立起帝国后,他们散布这样的观念,即他们的祖先是作为塞尔柱人的军事首领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而非普通的游牧民,以此提升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年》,第13页。

② 戴维森著,张增建、刘同舜译《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③ 参见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相似的论述还可参见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52页。

④ 参见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土耳其史》,第15—16页。

⑤ 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第33—41页。

⑥ 哈全安《中东国家史610—2000:奥斯曼帝国史》,第25页。

⑦ 参见凯末尔·瑟拉伊《阿赫麦迪笔下的奥斯曼王朝历史》(Kemal Sllay, “Ahmedi’s History of the Ottoman Dynasty”),《土耳其研究杂志》(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1992年第16卷,第129—200页。

⑧ 阿舍克帕夏扎代,原名德尔维希·阿赫麦德(Derviş Ahmed),15世纪奥斯曼史家,著有《奥斯曼传奇》(Tevārīh-i āl-i ‘Osmān)一书。

⑨ 西奥多·斯潘多尼斯(Theodore Spandounes),可能出生于威尼斯,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留驻奥斯曼帝国。他的姑妈玛利亚(Maria)是一名塞尔维亚公主,后嫁给素丹穆拉德二世。西奥多·斯潘多尼斯也因此得以了解奥斯曼宫廷信息。参见西奥多·斯潘多尼斯《奥斯曼帝王起源考》(Theodore Spandounes, 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唐纳德·尼克尔编译(tr. and ed. by Donald M. Nicol),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 参见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2—312页;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六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27—234页。

本斯认为欧洲因素起了关键作用。^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Mehmed Fuad Köprülü)^②指出,奥斯曼帝国起源于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部落(Turkish tribes)^③。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塞尔柱罗姆素丹国与伊尔汗国的行政体系,^④从而否定了吉本斯的观点。吉本斯与科普鲁卢等学者揭开了 20 世纪学术界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问题研究的序幕,但在当时,他们的主张并未得到以西欧语言为载体的主流史学术界公认。^⑤

20 世纪 30 年代,奥地利历史学家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 1894—1978, 简称维特克)提出了“加齐起源说”,对奥斯曼早期国家过程进行系统梳理,产生深远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在论及奥斯曼早期国家问题时,“加齐”(Ghâzi)^⑥一词几乎成为必须提及的词汇。^⑦ 11—16 世纪,“加齐”一词在伊斯兰世界受到广泛使用,在各个地区具有不同含义,但往往具有宗教意味^⑧。然而,在后来创作的许多作品中,“加齐起源说”(Ghazi Thesis)中有关“圣战”方面的内容被严重放大^⑨。在一些涉及该问题的通史类作品中,原先被维特克否定的奥斯曼游牧部落起源说又被不加分辨地添加进来,造成了诸多杂糅的观点。因此,本文试图在爬梳维特克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加齐起源说”的叙事范式,并归纳相关理论论争,从而在纷繁芜杂的理论与史料中阐释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客观历史真相。

- ① 参见 W. L. 兰格(W. L. Langer)、R. P. 布莱克(R. P. Blak)《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及其历史背景》(William L. Langer & Robert P. Blake,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Turks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2 年第 37 期,第 474 页。
- ② 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Mehmed Fuad Köprülü) (1890—1966), 土耳其历史学家、政治家, 出身于著名的科普鲁卢家族, 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推动者。其关于奥斯曼帝国形成问题相关的作品包括《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 当地穆斯林资料呈现出的历史与文化》(Mehmed Fuad Köprülü, *The Seljuks of Anatolia: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Local Muslim Sources*, tr. and ed. by G. Leiser) 犹他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奥斯曼帝国的起源》(Mehmed Fuad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G. 莱泽尔(G. Leiser) 编译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③ 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著, G. 莱泽尔编译《奥斯曼帝国的起源》(Mehmed Fuad Köprülü, *The Orig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tr. and ed. by G. Leiser), 第 76 页。
- ④ 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 页。关于塞尔柱罗姆素丹国的行政体系, 可参见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著, G. 莱泽尔译《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 当地穆斯林资料呈现出的历史与文化》(Mehmed Fuad Köprülü, *The Seljuks of Anatolia: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Local Muslim Sources*, tr. and ed. by G. Leiser) 犹他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23—29 页。
- ⑤ 吉本斯的作品被认为忽视了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中的土耳其、伊斯兰因素, 而对于科普鲁卢作品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其民族主义情节。参见杰马尔·卡法达尔《两个世界之间: 奥斯曼国家的构建》(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伯克利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3—42 页。
- ⑥ “加齐”为阿拉伯语词汇, 即 *غزى*, 指进行“加扎”^⑦ 入侵、征服的人。
- ⑦ 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了欧美学术界有关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的叙述, 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土耳其奥斯曼历史研究学者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nlık) 同样接受了“加齐起源说”。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7—8 页。
- ⑧ 参见阿里·阿努沙尔《加齐素丹与伊斯兰边疆: 对于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的比较研究》(Ali Anooshahr, *The Ghazi Sultans and Frontiers of Isla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3 页。
- ⑨ 欧洲对伊斯兰存在长期恐惧, 对西方人而言伊斯兰长期是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 这种思维在许多有关奥斯曼扩张的西方作品中仍可找到, 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东方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第 74—95 页。

一、维特克对“部落起源说”的质疑

1937年5月,维特克受著名东方学家爱德华·丹尼森·罗斯(Edward Denison Ross)^①等伦敦大学校董的邀请前往伦敦,在那里对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概述了中世纪安纳托利亚的相关历史,提出了有关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的颠覆性看法,即“加齐起源说”。维特克提出的“加齐起源说”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奥斯曼早期历史的叙事模式,而他本人也因“加齐起源说”而声名鹊起。

在保罗·维特克提出“加齐起源说”之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奥斯曼人起源于游牧部落,由部落产生国家。15世纪始,奥斯曼人创作了编年史料,将奥斯曼君主的祖先归于一个部落谱系。族谱祖先是努哈(诺亚)(Noah),之后下传五十多代至奥斯曼^②。而在这一谱系中,乌古思人^③的地位尤为突出。乌古思汗(Oghuz Khan)^④有六个儿子,分别是太阳汗(Gün Khan)、月亮汗(Ay Khan)、星星汗(Yıldız Khan)、蓝天汗(Gök Khan)、高山汗(Dağ Khan)与大海汗(Deniz Khan),他们各育有四子,形成乌古思24支部落。^⑤奥斯曼人将自己的祖先归于太阳汗,以及他的长子卡依(Kayı/Qayı)^⑥,意味着奥斯曼人出身于乌古思汗长子长孙的谱系^⑦。

一些编年史称,卡依的后代、奥斯曼的祖父苏莱曼(Sulayman)原是马罕(Mahan)地区^⑧的统治

- ① E. 丹尼森·罗斯(1871—1940)是英国东方学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东方语言。1896—1901年,罗斯任伦敦大学波斯语教授。1916年,伦敦大学增设东方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聘罗斯为院长,任职达22年之久,1938年退休。
- ② 即奥斯曼一世(Osman I)(1280/90—1324/6),奥斯曼帝国的开创者,他可能于1258年前后出生,伊本·白图泰提到他的名字是奥斯曼·鸠哥(عثمان جوق),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年》(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ume I: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mpire, 1280—1808*),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参见伊本·朱笛笔录,李光赋译《异域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755页。
- ③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完成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الترك ديوان لغت”)称,突厥人(الترك)(al-turk)的祖先是挪亚之孙,雅派司之子突厥,乌古思人(غز)是突厥二十部落之一,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2页。
- ④ 14世纪波斯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dl Allāh)(1247—1318年)在《史集》中称,乌古思汗是雅弗(突厥人称雅弗为阿不勒札汗)的孙子合刺汗的儿子,“乌古思曾征服伊朗、土兰、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富浪等所有各国”,畏兀儿、钦察、康里、哈刺鲁、合刺赤等都是出自乌古思及其后裔、亲属的部落,参见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2—140页。
- ⑤ 太阳汗,音译为坤汗,是乌古思汗的长子,其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海亦(卡依)(Кайи)(Kayı)、次子巴牙惕、三子阿勒-合刺兀里、四子合刺-牙兀里;月亮汗,音译为爱汗,是乌古思汗的次子;星星汗,音译为余勒都思汗,是乌古思汗的第三子;蓝天汗,音译为阔阔汗,是乌古思汗的第四子,其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巴颜都儿、次子必赤涅、三子札兀勒都儿(Джаулдур)(Çavuldur)、四子赤卜尼;高山汗,音译为塔黑汗,是乌古思汗的第五子;大海汗,音译为鼎吉思汗,是乌古思汗的第六子,其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必克的儿、次子不克都思、三子亦哇、四子乞尼黑(qīnīq)(kınık)(塞尔柱人可能出自该族系)。参见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29页,第132—147页,第339页,第343页。
- ⑥ 乌古思各分支皆有独特徽记(tamgha),卡依一族徽记可参见阿尔坦·切廷《马穆鲁克历史记录中的乌古思土耳其人》(Altan Çetin, “Oghuz Turks in the Account of a Mamluk History”),《伊斯兰研究杂志》(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2009年第3期,第379页。
- ⑦ 相关谱系图可参见小笠原弘幸《古典时期奥斯曼王朝正统性的创造——自乌古思传说分析》,《史学杂志》2009年第1期,第1903页。
- ⑧ 位于梅尔夫(Merv)地区(今属土库曼斯坦),是阿布·穆斯林的出生地,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Paul Wittek, Colin Heywood, ed.,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者,由于蒙古人入侵被迫带领族人远走他乡。苏莱曼在渡过阿勒颇贾巴尔(Jaber)城堡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时溺水身亡,其子埃尔托格鲁尔(Ertoghru)率领族人进入安纳托利亚,栖身于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附近拜占庭与塞尔柱的边境地带。其子奥斯曼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奥斯曼帝国。以上便是15世纪以来,奥斯曼人对于自身来源与国家形成的主要看法。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版本,但基本的说法皆是奥斯曼君主出身于乌古思汗的谱系。由于乌古思人被认为是原居中亚地区的土耳其/突厥^①游牧人群^②,因此奥斯曼人的起源问题便与土耳其/突厥游牧部落联系在了一起。在维特克之前,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Mehmed Fuad Köprülü)即从这种部落起源说出发来解释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③。

维特克对对奥斯曼部落起源说持否定态度。他发现15世纪奥斯曼编年史将奥斯曼人的祖先归于太阳汗和蓝天汗两种自相矛盾的历史记录^④。由于作者无法辨别两者孰对孰错,甚至有的编年史中出现将两种谱系并置的现象^⑤。很多编年史中并未出现对奥斯曼祖父苏莱曼的记载,而上文提到的相关叙述更像是11世纪,塞尔柱王公苏莱曼·本·古塔鲁米什(Sulayman ibn Kutlumush)故事的翻版,这位苏莱曼在塞尔柱与拜占庭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成为塞尔柱在罗姆地区的素丹。他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1095—1099年)后从安纳托利亚返回叙利亚,并在阿勒颇附近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胜利,不久就阵亡了,但并非溺亡,而其子克勒赤·阿斯拉(Kılıç Arslan)^⑥是在这里的哈布尔(Khabur)河(即幼发拉底河)溺亡的,哈布尔可能在后来讹传成了贾巴尔(Jaber)。除此之外,维特克发现在15世纪及之前对奥斯曼祖先的追述中,还出现了奥斯曼人起源于阿拉伯人的说法^⑦,甚至存在奥斯曼是拜占庭科穆宁王朝^⑧王室后裔的历史记载。^⑨可以说,从奥斯曼的“祖父”苏莱曼开始,之上的奥斯曼谱系皆存在被后人编改的嫌疑,因此,并不能被视作真实存在的历史。^⑩

- ①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习惯上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Turkey),称奥斯曼人为“土耳其人”(Turk),但在奥斯曼帝国内,“土耳其人”(Turk)一词具有贬义,主要指生活在小亚细亚的牧民和农民,近代欧洲学者在研究中将“土耳其人”与汉语文献中的“突厥”联系起来,参见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7、90页;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第7—8页;戴维·库什纳《当代土耳其的自我感官与身份》(David Kushner, “Self-Perception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urkey”),《当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7年第2期,第219页。
- ② 例如拉施特在《史集》中称,“所有蒙古人、突厥诸部落和一切游牧人(直译作:草原居民)均出自他(即不勒札汗(雅弗)拉施特认为他是乌古思汗的祖先)的氏族”,引自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0页。
- ③ 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著, G. 莱泽尔编译《奥斯曼帝国的起源》,第72—77页。
- ④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39页。
- ⑤ 萨阿德·丁·《历史桂冠》(Sa‘d ed-Dîn, *Taj at-tawârikh* (Constantinople, Istanbul, 1279—1280), i, 13 ult. and 15) 转引自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40页。
- ⑥ 克勒赤·阿斯拉(Kılıç Arslan /Kilij Arslan, 1092—1107年),塞尔柱罗姆素丹国苏丹,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期间他统治该苏丹国,并多次战胜十字军,1107年他在与大塞尔柱素丹国的作战中失败,溺亡于哈布尔河,参见克劳德·卡昂著, P. M. 霍尔特编译《土耳其的形成——塞尔柱罗姆素丹国:11—14世纪》(Claude Cahen, P. M Holt, tr. and ed., *The Formation of Turkey—The Seljukid Sultanate of Rum: Eleventh to Fourteenth Century*) 朗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
- ⑦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39页;奥斯曼人曾声称自身的祖先是来自希贾兹的阿拉伯人,并且主张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某位同伴的后人,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 ⑧ 科穆宁(Comneni)家族曾建立起拜占庭科穆宁—杜卡王朝(Komnenos) (1081—1185年),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9、273页。
- ⑨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39页。
- ⑩ 此外,在1453年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西方还流传着土耳其人起源于特洛伊人的说法。参见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第6页。

另一方面,维特克从历史上游牧部落形成国家的角度出发,佐证他对奥斯曼部落起源说的否定。他解释道:

“的确,在已知的历史中,游牧部落曾经建立过许多势力强大的政权,但没有一个能像奥斯曼帝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游牧部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沉湎于内部斗争,一些部落凌驾于其他部落,并迫使其他部落屈服,逐渐形成一个统一集团(single unit)。……而据我们了解,13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游牧部落(nomadic Turkish tribes)之间并未发生激烈斗争。此外,尽管奥斯曼人认为相较于我们来说,他们的扩张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相比于游牧者入侵的速度——例如,蒙古人,他们还是相差甚远。”^①

之所以研究者可以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资料中发现游牧部落的蛛丝马迹,原因在于奥斯曼帝国所吞并的安纳托利亚诸国^②中存在部分部落民,这些部落民原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维特克发现,奥斯曼编年史记载,奥斯曼的敌国格尔米杨(Germiyan)^③中有一群人被称为“恰夫达尔鞑靼”(Çavdar/Tshaudar Tatars)^④。“恰夫达尔”(Çavdar)一词可能由“札兀勒都儿”(Çavuldur)一词演变而来,也就是说,“恰夫达尔鞑靼”是蓝天汗的后代,他们在被奥斯曼人征服后融入后者之中,这或许是后来的编年史中将奥斯曼人的祖先归于蓝天汗的主要原因。奥斯曼人自身没有任何与这种传统一样的起源,其仅仅是在后来才被引入他们的历史中的。^⑤因此,不可能找到奥斯曼帝国与部落的自然联系,其必定建立于其他基础之上,^⑥而保罗·维特克认为这一新的基础就是“加齐”。

二、“加齐起源说”对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的解释

在否定奥斯曼帝国的部落起源说后,维特克转而认为,奥斯曼早期国家是由“加齐团体”^⑦建立的,“加齐”是一种边疆战士团体,从事攻击异教徒的“圣战”。

第一,维特克阐释了什么是“加齐”。“加齐”具有类似圣战者(穆吉哈丁^⑧)的含义,奥斯曼帝国

①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37页。

② 塞尔柱罗姆苏丹国崩溃后,一系列埃米尔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其中包括特克(Teke)、哈米德(Hamid)、格尔米杨(Germiyan)、艾登(Aydın)等,至1402年安卡拉之战前,奥斯曼吞并或控制了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参见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的构建》(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 - 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帕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③ 格尔米杨(Germiyan),13—14世纪安纳托利亚国家,位于奥斯曼南部,首都为屈塔希亚(Kütahya),1375—1376年(穆拉德一世统治期间),其与奥斯曼发生过战争,并被击败,参见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的构建》(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 - 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帕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

④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39页。

⑤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42页。

⑥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43页。

⑦ 保罗·维特克称“‘加齐团体’即穆斯林宗教的捍卫者,穆斯林边疆战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体,与异教徒作战”。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44页。

⑧ 穆吉哈丁即阿拉伯语مجاهد,意为战士,士兵,勇士;圣战者,参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正是建立在“加齐团体”的之上。维特克发现在布尔萨清真寺的 1337 年铭文^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布尔萨于 1326 年被奥尔汗占领, 是奥斯曼人的第一个首都,^②1337 年时布尔萨正处于奥尔汗统治之下) 其显示出当时奥斯曼统治者的头衔为“素丹·加齐们的素丹之子·加齐·加齐之子, 大地贵族, 世界英雄……奥斯曼之子奥尔汗”(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âzîs, Ghâzî, son of Ghâzî, marquis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 (Sultan ibn sultan al-ghuzat, ghazî ibn al-ghazî, Shuja' ad-daula wa'd-dîn, marzban al-afak, bahlavan-i jihan, Orkhan ibn 'Othman.)^③。而对于铭文中的“加齐”是什么, 维特克引用了 14、15 世纪奥斯曼诗人阿赫麦迪(Ahmedi)创作的诗歌《伊斯坎德记》中的段落加以解释:

“加齐(Ghazi)是安拉宗教的工具, 是清扫多神教(伊斯兰教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视为多神教——保罗·维特克注)以净化大地的真主之仆; 加齐是真主之剑, 是信仰者的保护者与庇护者。如果他为主道而牺牲, 请不要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住进了安拉的至福之所, 他获得了永恒的生命。”^④

阿赫麦迪的诗歌显示“加齐”具有类似圣战者(穆吉哈丁)的含义, 维特克对此内涵加以采用, 不过维特克之后为“加齐”赋予了更多含义, 使“加齐”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他提出奥斯曼国家正是建立在“加齐”的基础之上, “他们曾是一个加齐共同体, 即, 穆斯林宗教的捍卫者, 穆斯林边疆战士(march-warriors)的共同体, 投身于与异教徒的战斗之中”^⑤。

第二, “边疆社会”与加齐团体的形塑。维特克对“加齐”的定义以“边疆(marches)^⑥社会”为前提。他认为, 在伊斯兰世界与异教徒领土接壤地区存在一个独特的边疆社会。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战利品是边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依靠力量。二是边疆地区与内地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种族、语言呈现多元化, 在政治与宗教上同内地存在渐行渐远的张力。三是边疆地区形成了许多战士家族(warrior clans), 这些军人效忠于自己的首领, 他们与内地政府间的关系疏远, 排斥来自内地的行政干涉, 例如税收, 要求内地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荣誉, 以及财政与军事上的援助, 以获取自身更大的独立地位。^⑦

维特克在中亚与拜占庭边疆地带发现了“加齐”的存在。9 世纪, 穆斯林的边疆已被土耳其人/突厥人主导, 他们是军队的主力。土耳其人/突厥人参与这场首次出现于呼罗珊与河间地区的“加齐

① 该铭文现存于布尔萨萨哈达(清真言)清真寺(Şehadet Mosque)东门, 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第 34 页。

② 斯坦福·肖认为耶尼谢希尔(Yeni Şehir)为奥斯曼人的第一座都城, 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 加齐帝国, 1280—1808 年》(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ume I: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mpire, 1280 - 1808*) ,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 第 14 页。不过据笔者所见, 大多数学者认为奥斯曼早期国家的第一座首都为布尔萨。参见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帝国, 1300—1650: 权力的筑建》, 第 9 页; 史蒂芬·特恩布尔《奥斯曼帝国 1326—1699》(Stephen Turnbull *The Ottoman Empire 1326 - 1699*) ,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 2014 年版, 第 13 页。

③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 44 页。

④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 44 页。

⑤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 44 页。

⑥ March 是对土耳其语“Uç (Uj/ Uc/)”一词的对译, 相关概念参见麦赫迈德·福阿德·科普鲁卢著, G. 莱泽尔编译《奥斯曼帝国的起源》, 第 77 页。

⑦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 46 页。

运动”^①。维特克将“加齐”定义为与正规边防军相对的松散团体,他们受到圣战思想的感召,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战利品。^②

第三,罗姆的素丹国与加齐国家达尼什曼德王朝的兴衰。11世纪初,土耳其人/突厥人的乌古思部落兴起了移民运动,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边疆地带上的“加齐”力量因此剧增。乌古思人因塞尔柱王朝封地的吸引来到中东,他们属于自治的军事团体,许多部落保持游牧生活。这些战士群体和游牧部落与内地王朝间的联系十分松散,并且经常给国家带来麻烦。于是,他们自愿或被国家引导,进入安纳托利亚的边疆地带,并加入“加齐”之中,这大大增强了“加齐”们的军事力量。在1071年的曼奇克特之战前,他们甚至劫掠了塞巴斯蒂亚(Sebastia)(今锡瓦斯,Sivas)、凯撒利亚(Caesarea,今开塞利,Kayseri)与伊康(Iconium)(今科尼亚,Konya)等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型城市。^③

1071年,拜占庭帝国在曼奇克特战役中被塞尔柱素丹国打败,陷入混乱之中,其边防线处于崩溃状态,这使“加齐”们的进攻更加猛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体加入。“加齐”仍具有的边疆战士的属性,不同于纯粹的土耳其人/突厥人与部落民,混合了边疆地带的不同文化,因此他们的占领未导致当地文化的割裂。曼奇克特之战后,塞尔柱王公苏莱曼在此建立了国家,即后来史家所称的罗姆素丹国(Sultanate of Rum)或罗姆的塞尔柱(Seljuks of Rum)。但在建国初期,塞尔柱罗姆素丹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夺取叙利亚、两河流域等旧有的穆斯林统治区。而与此同时,“加齐”们建立了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④。这是一个保持浓厚“加齐特性”的国家,致力于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占领敌国领土,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备的行政组织。

12世纪中叶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动,“加齐国家”达尼什曼德王朝的处境逐渐恶化。在经历多次失败后,罗姆素丹国放弃了对伊斯兰核心区域的争夺,迁都科尼亚。此后,罗姆素丹国投入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争夺中,与达尼什曼德王朝进行角逐。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之后,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防线得以巩固,“加齐”们停止入侵,以战利品为经济基础的达尼什曼德王朝发生内讧。^⑤而罗姆素丹国则因以下两种因素兴起:一是吸收了城市伊斯兰行政体系,这意味着其可以有效经营所占土地;二是其高贵的王室身份吸引了大量来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的神学家、商人与工匠。达尼什曼德王朝在与罗姆素丹国的竞争中落败,大约亡于1180年。

第四,12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罗姆素丹国与拜占庭帝国间的“边疆社会”。尽管“加齐国家”达尼什曼德王朝最终崩溃,但小亚细亚的“加齐运动”并未因此停息。罗姆素丹国占据了达尼什曼德王朝的大部分地区,并与拜占庭帝国形成对峙状态。由于双方势均力敌,边境线逐渐稳定下来,结果在两者的边境地带形成了一个“边疆社会”。在罗姆素丹国这边,边疆战士被称为“边疆土耳其人”

① 参见巴托尔德著, E. J. W. 吉布等译《以蒙古入侵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W. Barthold, E. J. W. Gibb, e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 第214—215页。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也受到巴托尔德对于土耳其一突厥史研究的影响,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43、46页。

②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47页。

③ J. 劳伦《1081年以来西亚的拜占庭和塞尔柱土耳其人》(J. Laurent, *Byzance et les Turcs Seldjucides dans l'Asie occidentale jusqu'en 1081* (Nancy, 1913), 24 ff.) 转引自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47页。

④ 达尼什曼德王朝建立的具体时间不明, 有关这一王朝的最初记载出现于1095年前后, 其地域范围囊括锡瓦斯至坎帕多西亚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 参见克劳德·卡昂著, P. M. 霍尔特编译《土耳其的形成——塞尔柱罗姆素丹国: 11—14世纪》, 第11页。

⑤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第49页。

(“Turks of the *uj*”)或“土库曼人”(Turkomans)^① 这些土库曼人中既包含前达尼什曼德王朝的遗民,也包含游牧的部落民^②。他们在边疆地区的山地找到了合适的居所,并不断威胁着拜占庭国土的安全,而许多土库曼人也加入“加齐”行列。

12世纪末13世纪初,罗姆素丹国与拜占庭帝国先后陷入内乱,二者边疆地带的封建主试图建立独立的政权。不过,第四次十字军战争(1202—1204年)间接促进了拜占庭对边疆地区的控制。1204年,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被迫迁都尼西亚(今伊兹尼克)^③。由于拜占庭帝国全部精力投入到安纳托利亚,因此边疆防线得到巩固,土库曼人与“加齐”的袭击与劫掠变得越来越得不偿失。1204年,罗姆素丹国的篡位者鲁克纳丁(Ruknoddīn)^④死后,流亡拜占庭的凯克霍斯娄(Kaikhosrou)^⑤在拜占庭与土耳其人边疆首领的援助下回国继位。凯克霍斯娄素丹与拜占庭皇帝关系良好,两国大体进入和平的时期。^⑥“加齐团体”转向进攻别的异教徒国家,如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的亚美尼亚人政权(Little Armenia)。^⑦

三、“加齐起源说”对奥斯曼帝国形成的解释

“加齐团体”本身并非正规的军事组织,其具有很大的松散性,这限制了团体的发展。13世纪,中东兴起了以浮图瓦(futuwwa)为信条的宗教运动。^⑧浮图瓦信条与“加齐团体”结合,增强了后者的凝聚力与稳定性,成为一种与其他边疆军事集团相区分的独特团体。

对于浮图瓦,维特克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种管理标准,借此生活中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依赖,它以神秘主义的方式理解伊斯兰教。许多伊斯兰社团成员将浮图瓦作为自己的道德引领。”^⑨浮图瓦原则类似于欧洲的骑士精神,追随者向首领宣誓效忠,首领对追随者授予职位。艾登(Aydın)^⑩王室

① 拉施特在《史集》中称“古代没有突厥蛮(土库曼)(Туркмены)一词;凡外形近似于突厥人的游牧部落,概被称为突厥,[但]各部都有某个特殊的名称。当乌古思的这些部落从其本土来到河中诸国和伊朗国,并在这些地方生息繁衍的时候,他们的外形受到水和空气的影响,逐渐变成近似于大食人(tāzīk)的容貌。但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大食人,所以大食人称他们为突厥蛮,意即类似于突厥者。”引自拉施特主编,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0、364页;在本文中出现的土库曼,如无特殊说明皆与土耳其人(Turk)同义。

②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0—51页。

③ 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拉斯卡利斯家族的塞奥多利(Theodore I Laskaris)(1204年至1221年在位)于十字军攻击君士坦丁堡期间,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登基,之后逃亡布尔萨,后在塞尔柱素丹的支持下在尼西亚立足,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也被称为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1204—1261年),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第304页。

④ 即鲁克·纳丁·苏莱曼二世(Rukn al-Dīn Süleyman II),1196/7年至1204年期间塞尔柱罗姆素丹国素丹,参见克劳德·卡昂著, P. M. 霍尔特编译《土耳其的形成——塞尔柱罗姆素丹国:11—14世纪》,朗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⑤ 即吉亚斯丁·卡伊·凯霍斯鲁一世(Ghiyāth al-Dīn Kay Khusraw I),1192年至1196年及1205年至1211年在位,参见克劳德·卡昂著, P. M. 霍尔特编译《土耳其的形成——塞尔柱罗姆素丹国:11至14世纪》,第277页。

⑥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⑦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⑧ 浮图瓦,另译弗士韦,是一种具有侠义精神的武士组织,该组织自称溯源于阿里,成员叫作“非特彦”(fityān,武士),介绍新成员加入组织的时候,必须举行特别的仪式,成员都穿特殊服装。参见菲利浦·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第438页。

⑨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⑩ 艾登(Aydın):14—15世纪安纳托利亚国家,位于今伊兹密尔(İzmir)附近,于14世纪90年代被巴耶济德一世占领,参见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的筑建》(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帕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页。

的一位埃米尔曾被梅夫拉维(Mevlevî)德尔维希教团的谢赫任命为“加齐们的素丹”。他从谢赫的手中接受了战棍(war-club),并将其置于头顶,并宣布“凭此战棍,我将首先确保坚忍、克制怒火,然后杀死所有与信仰为敌的人。”这场仪式意味着埃米尔接受谢赫为其“长老”,表明“加齐团体”内部成员间具有权利与义务关系。^①

在中东地区,以浮图瓦原则成立的第一个团体是艾希(Akhîs)^②兄弟会,主要成员是工匠与商人,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纳斯尔(al-Nasir)^③(1180—1225年)的支持。他希望凭借兄弟会的力量重新获得世俗权力,并抗击十字军。哈里发的支持使浮图瓦信条与兄弟会组织在中东地区流行起来,并传入小亚细亚地区。浮图瓦原则与“加齐”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加齐团体”的凝聚力与稳定性。这样,“加齐团体”成为一种类似于“圣战者骑士团”的组织,团体成员向其首领宣誓效忠,首领带领他们掠夺战利品。

13世纪,由于蒙古人入侵,大量土耳其游牧部落(tribes of Turkish nomades)与散兵游勇组成的军事团体进入罗姆素丹国^④和边疆地区,造成该地区的失控。1239年前后,土库曼人中爆发了一场名为巴巴·依沙克(Baba Ishak)^⑤的宗教与社会动乱。这场运动造成罗姆国家与边疆地区的进一步疏离,削弱了国家实力。1243年,罗姆素丹国被蒙古军队击败,后沦为附庸。^⑥

在蒙古人入侵时期,“加齐团体”的力量大增,其原因有三:一是罗姆素丹国内逃难的将领与才俊成为“加齐”中的领袖。^⑦二是伊朗与中亚的德尔维希等宗教人士也加入到“加齐团体”之中,他们传播的教义被正统宗教视为异端,在内地城镇得不到欢迎,被迫逃至边疆。他们的到来满足了“加齐”们的宗教需求,再度点燃了“加齐”们进攻异教徒的热情。三是蒙古人入侵造成大量难民作为人口补充,边疆战士的实力大增,对拜占庭的进攻越发凶猛。^⑧

1261年,拜占庭帝国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因此将其主要精力转向巴尔干方向,而对于安纳托利亚边疆地区则疏于管理,防御设施年久失修。巴列奥略王朝(Palaeologoi)的经济政策使士兵-农民感

①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60页。

② 曾造访罗姆地区的14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提及“在罗姆国的土库曼,每个城市和大小村镇都有那么一些自称艾希的人……艾希这个词的读音与阿拉伯语中‘我兄弟’这个词的读音相一致。复数是伊希叶。异乡人如果遭到什么厄运、欺凌、不公,他们会迅速地给他们送来食物。解决他们的必需……所谓艾希,在他们那里是这样一种人。他把作坊工人、独身青年和那些赤贫者都聚集在一起,组成‘青友社’,而他们则推举艾希为自己的首领。”此外,他还提道“这些地方的习惯是,凡没有素丹的地方,青友社头领艾希就是当地的统治者。”参见伊本·朱兹笔录,李光赋译《异域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9页。西方学者对于小亚细亚浮图瓦、艾希团体等的认识主要来自伊本·白图泰的游记,参见G. G. 阿纳基斯《奥斯曼帝国艾希,拜克塔什德尔维希,与工匠中的浮图瓦传统》(G. G. Arnakis, “Futuwwa Tradi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Akhis, Bektashi Dervishes, and Craftsmen”),《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53年第4期,第232页。

③ 纳斯尔,另译纳绥尔,是塞尔柱人控制下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承认纳绥尔的宗主权,纳绥尔也试图利用塞尔柱人内部的矛盾恢复哈里发的实权,并将花刺子模人引入其与塞尔柱人的斗争中,最终被花刺子模人控制,参见菲利浦·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第438—439页。

④ 维特克的材料来自那萨维著, O. 霍达思译《扎拉丁·明布尔努传》(Nesawî, 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 ed-dîn Mankobirti, tr. O. Houdas (Paris, 1895), 264),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4页。

⑤ 即1239—1241年的巴巴起义(Babaî Revolt), 参见杰马尔·卡法达尔《两个世界之间:奥斯曼国家的构建》(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伯克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⑥ 伊儿汗国于1277年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起直接统治, 参见杰马尔·卡法达尔《两个世界之间:奥斯曼国家的构建》(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伯克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⑦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5页。

⑧ 保罗·维特克著 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5—56页。

到不满,致拜占庭边防军抵抗意志下降,甚至叛国投敌,挥师倒戈。^①到13世纪末,安纳托利亚西部兴起诸多土耳其人政权,维特克认为其皆由“加齐团体”建立,称这些政权为“加齐埃米尔国”(Ghazî emirate)^②,其中就包括奥斯曼早期国家。^③

维特克认为,13世纪末建立的这些“加齐国家”存在固有问题,即它们由纯粹的战士集团建立,以战利品为经济基础,同时缺乏管理国家的技能,而一旦达到掠夺的极限,也就是说,缺乏可供继续掠夺的敌国领土,或敌人过于强大而使掠夺得不偿失时,这些“加齐国家”便会陷于内乱之中,这是维特克所认为的“加齐国家”达尼什曼德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何奥斯曼人的“加齐国家”摆脱了类似的命运,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一个帝国?维特克认为原因在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在地理上位于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区域,占领这里极为困难,“加齐战争”得以长期延续。其影响则是:一方面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加齐团体”投入他们的麾下;另一方面,也为奥斯曼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时间。奥斯曼国家位于君士坦丁堡至科尼亚的贸易路线上^④,奥斯曼人与原罗马帝国长期保持联系,以乌莱玛为主要载体的伊斯兰城市文化被不断吸纳进奥斯曼国家之中,并在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等城市后,迅速主导这些城市,他们通过自身的行政技能使城市得以正常运转,为奥斯曼统治者收缴获得被占者的贡赋。也就是说,奥斯曼早期国家此时已完成了从“加齐国家”向真正国家的蜕变。到进攻巴尔干时,其已经与以往的“加齐运动”不同,这些行动不再是由独立的“加齐团体”采取的自发行动,而是由深谋远虑、组织良好的国家组织发起^⑤。

维特克原版的“加齐理论”几乎完全否定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于游牧部落的说法,转而认为其建立在“加齐团体”的基础之上。“加齐”是边疆战士的一类,受到“伊斯兰圣战”理念感召而投身于与异教徒的战斗中,而因其非正规军队的性质,因此组织结构松散,在13世纪后,由于与浮图瓦原则的结合,团体的稳定性增强,成为一种类似于欧洲骑士团的战士团体。同时,“加齐”具有与所有边疆战士相同的特性,他们以掠夺战利品为生,是纯粹的战士团体,缺乏从事经济生产的技能,而长期的边疆生活使他们与内地关系疏远,反而与边界另外一侧的敌人在人种、文化上越发融合,使他们从事的“圣战”并未呈现出“要么皈依要么死亡”的形式^⑥。而奥斯曼早期国家之所以可以在众多“加齐国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方面,这里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地带,在其他“加齐国家”迅速侵占周边的异教徒领土,从而陷入无战利品可得的困境时,奥斯曼“加齐国家”附近仍存在大量可供掠夺的拜占庭领土,这使奥斯曼早期国家可以得到其他地区加齐武士源源不断的

①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8页。

② 13世纪末建立于安纳托利亚的土曼诸国一般被称为埃米尔国或贝依国(beylik),英语中称“公国”(principality),在维特克的作品中“加齐埃米尔国”(Ghazî emirate)与“加齐国家”(Ghazî state)是可替换的,两者在含义上并无区别。维特克认为这些“加齐国家”包括门特塞(Menteshe)、艾登(Aydın)、奥斯曼(Ottoman)、萨鲁汗(Sarukhan)、锡诺浦(Sinop)等,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57—59页。

③ 奥斯曼人自称其祖先在卡拉贾希萨尔(Karajahisar)建立起政权,其位置可能在下萨卡里亚河谷(Lower Sakarya valley)的马拉基纳(Malagina),参见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帝国,1300—1650:权力的构建》,第8页。

④ 奥斯曼人控制的布尔萨地区是“丝绸之路”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一环,参见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唐纳德·夸塔特编《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史,第一卷:1300—1600年》(Edited by Halil İnalçık with Donal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Volume One 1300 - 1600*),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55页。

⑤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65页。

⑥ 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第132页。

补充;^①另一方面,奥斯曼人缓慢的占领过程使其获得了转型的时间,在此期间,由于其与原罗姆苏丹国内地联系紧密,因此吸收了大量具有行政管理技能的城市伊斯兰教人员,这使奥斯曼人可以将所占拜占庭城市迅速运转起来,从而为奥斯曼人提供战利品之外的经济来源。这种混合的特性并未掩盖奥斯曼的“加齐”性质(“圣战”与文化融合性),其推动奥斯曼早期国家不断扩张,最终成为一个帝国。^②

四、“加齐起源说”述评

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长期影响着学术界对奥斯曼国家形成问题的话语叙述,^③然而,后来的学者通常仅是关注“加齐起源说”的某一方面,即与“圣战”有关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维特克对于“边疆社会”的论述被忽视,而“加齐”几乎成为“圣战者”(穆吉哈丁)的同义词。以土耳其奥斯曼史研究专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为例,尽管他接受维特克有关奥斯曼边疆公国的理念,但却将“加扎”(gaza)^④直接等同于“圣战”——“在1300年前后,奥斯曼国家作为一个投身于加扎(gaza),圣战(Holy War)的边疆小公国出现在拜占庭帝国与小亚细亚塞尔柱苏丹国的边界上”^⑤。而相关学者对于“加齐起源说”的否定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1986年,罗纳德·C.詹宁斯(R. C. Jennings)指出,“维特克理论的本质,即认为奥斯曼帝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土耳其圣战战士群落的出现,他们被伊斯兰教,即加齐(gazis)所吸引,来到拜占庭的边疆地区”^⑥。在此,“加齐”(gazis)已被等同于伊斯兰教(Islam)。而詹宁斯亦从圣战,即吉哈德理念出发对“加齐起源说”提出了质疑,提出吉哈德是穆斯林的圣战,不应出现基督徒加入,或与基督徒合作的情况。以此詹宁斯否定了奥斯曼国家起源于一个“加齐团体”的主张,认为奥斯曼统治者使用“加齐”的头衔(即布尔萨1337年铭文)仅仅是为了证明其合法性。

的确,由于资料的缺失,很难证实“加齐团体”的确存在于历史之中,维特克证明奥斯曼国家起源于“加齐团体”的直接证据也仅仅是布尔萨1337年铭文。^⑦可以说,“加齐起源说”夸大了“加齐”与“伊斯兰圣战”理念在奥斯曼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圣战(吉哈德)仅是“加齐起源说”的一个方面,并且,维特克已经说明“加齐”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具有“异端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原版的“加齐起源说”中,“加齐”的概念更接近于“边疆战士”。维特克事实上已经注意到奥斯曼国家具有

① 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62—63页。

② 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68—69页。

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事奥斯曼历史研究的英国与美国学者大多是维特克的学生,或其学生的学生,参见科林·海伍德《维特克与奥地利传统》(Colin Heywood, "Wittek and the Austrian Tradition"),《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88年第1期,第12页;在20世纪70年代,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将“加齐起源说”纳入其有关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的叙述,参见希思·沃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第7—9页。

④ Gaza在现代土耳其语中的意思为“伊斯兰圣战,宗教战争”,参见周正清,周运堂主编《土耳其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82页。

⑤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唐纳德·夸塔特编《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史·第一卷:1300—1600年》,第11页。

⑥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唐纳德·夸塔特编《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史·第一卷:1300—1600年》,第11页。罗纳德·C.詹宁斯《对于加齐起源说的一些思考》(R. C. Jennings, "Some Thoughts on the Gazi Thesis"),《维也纳东方杂志》(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1986年第76卷,第151页。

⑦ 铭文的真实性与如何解读该铭文皆存在争议。

宗教、人种、文化融合的特征。因此,“加齐起源说”的真正问题在于 作为一个团体的“加齐”(即类似欧洲骑士团组织的战士团体)是否存在,如果这一团体存在,那么战利品是否是这一团体唯一的经济来源。

对于为何研究奥斯曼起源问题的学者往往关注的是“加齐”“圣战”的一面,而非“边疆特性”的一面,希思·伍德·洛里(Heath W. Lowry)给出了部分解释。他指出,无论现代土耳其学者,还是巴尔干民族主义者都愿意相信奥斯曼是一个纯粹由土耳其人以武力征服出来的国家,这种说法有助于双方民族意识的构建,同时,双方皆无法接受对方族群在奥斯曼国家创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说法,而这是“加齐起源说”^①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②后来的通史作品往往不加分辨地采纳各种有关奥斯曼国家起源的说法,^③致使出现“加齐起源说”、“伊斯兰圣战”与游牧部落起源说等简单叠加的情况,这也对研究奥斯曼国家起源问题的学者造成了误导。

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体现着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历史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理论也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④。维特克以权威的材料验证提出“加齐起源说”,客观上制造出了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奥斯曼“加齐”想象。最晚到 20 世纪 70 年代,来自土耳其民族主义史学的奥斯曼土耳其一突厥游牧部落起源说,已与产生自 20 世纪西方史学术界的“加齐”想象彼此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更显“科学”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一突厥游牧部落加齐(已成为“伊斯兰圣战”的代名词)”起源说。这种观点认为,奥斯曼人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一突厥游牧部落,在“加齐圣战”(“伊斯兰圣战”)的感召下不断征服异教徒的土地,最终“从一个部落兴起了一个征服世界的国家”^⑤。而尽管这是一种偏向于历史叙述的奥斯曼帝国起源说,被从事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研究的专业学者所质疑和批评,但这种学说主张却在西方、土耳其学术界长期流行。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与该主张既满足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一突厥起源说,同时又符合西方世界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固有认知(其主张伊斯兰教与部落主义^⑥是理解中东地区问题的两大关键途径^⑦)有关。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逐渐主导东方学术界对于历史的研究与解释的历程。

① 将“加齐”或“加扎”等同于伊斯兰圣战的“加齐起源说”,而非维特克的原版“加齐起源说”。

② 详见希思·伍德·洛里《奥斯曼早期国家的本质》第 133 页。

③ 斯坦福·肖的作品《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 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者将奥斯曼帝国的起源视为土库曼游牧部落进行“加齐圣战”的结果,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0—22 页。关于其中相关内容的批判,可参见科林·因伯尔《对于〈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的评论》(Colin Imber, “Review of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78 年第 93 期。

④ 维特克对于“加齐”的重视可能受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影响,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加齐”称号,参见科林·海伍德《维特克与奥地利传统》(Colin Heywood, “Witteck and the Austrian Tradition”),《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88 年第 1 期,第 16—25 页;科林·海伍德《一段隐秘的历史:保罗·维特克(1894—1978)与奥斯曼早期国家》(Colin Heywood, “A Subterranean History: Paul Wittek (1894—1978) and the Early Ottoman State”),《伊斯兰世界》(Die Welt des Islams) 1998 年第 3 期,第 395 页。

⑤ 此句由 19 世纪末土耳其主义者纳末克·凯末尔(Namık Kemal)所说,参见保罗·维特克著,科林·海伍德编《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第 37 页;鲁迪·保罗·林德纳《中世纪安纳托利亚的游牧民与奥斯曼人》(Rudi Paul Lindner,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布卢明顿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 页。

⑥ 早期东方学家甚至主张“伊斯兰必须被还原为‘帐篷和部落’”,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 106 页。

⑦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2 页。

结 论

维特克的“加齐起源说”在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与美国学者希思·沃德·洛里的“劫掠同盟”假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鲁迪·保罗·林德纳“部落人类学”并称为20世纪解释奥斯曼早期国家的三种理论范式。^①该学说打破了昔日西方学术界认为的“加齐”等同于圣战的僵化思维,更强调其“边疆特性”的社会与地缘属性。但“加齐起源说”遭受到了各种学者的批判,其局限性则是相关史实材料不足,解读加齐概念仅依靠阿赫麦迪(Ahmedi)的《伊斯坎德记》(İskendername)与1337年布尔萨铭文。阿赫麦迪(Ahmedi)在大空位期(1402/3—1413年)^②创作《伊斯坎德记》(İskendername),目的是劝谏奥斯曼统治者专注于对异教国家作战,向欧洲方向扩张,而不要与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兰国家开战,以免重蹈巴耶济德一世的覆辙。其真实性值得商榷。

在奥斯曼早期国家问题的历史性研究方面,尚未产生被学术界公认的解释模式,而相关研究已经展现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齐起源说”和维特克所否定的“部落起源说”实际上反映了奥斯曼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多元形态,任何某一单一学说都不能反映当时的客观状态。对此,奥斯曼历史研究专家科林·因伯尔不无悲观地称“奥斯曼的早期历史犹如一个黑洞,填满这一黑洞的行为仅会造成更多的误导”^③。尽管如此,“加齐起源说”至少反映了奥斯曼早期国家形成的某一维度,并且提供了有关这一命题的新思考取向与研究旨趣。维特克不再完全采信有关奥斯曼国家起源的传统解释,重新审视古史材料,将“加齐”引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突破了某些历史型塑的思维框架,不再局限于对奥斯曼个人或其家族的讨论,展现出更加丰富的解释维度。

经过历时百年的研究,有关奥斯曼国家起源的客观历史图景逐渐显现,这一国家的崛起过程不再被仅仅视作游牧民的入侵或宗教战争。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表明,13世纪末的比提尼亚地区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多文明杂糅的地缘政治特征,奥斯曼早期国家诞生于这种宗教、种族融合进程之中,这一国家因而具有多元文化特性,这种特性有助于奥斯曼早期国家在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并最终在15世纪形成横跨亚欧的世界性帝国。

[本文作者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姜欣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宁凡)

① 后两种理论,笔者有专文阐释。

② 安卡拉之战后,奥斯曼国家陷入分裂状态,巴耶济德一世的众王子,苏莱曼·伊萨(İsa Çelebi)、穆罕默德(Mehmet Çelebi)为获得奥斯曼国家的领导权而展开争夺(后来,原先被帖木儿俘虏的穆萨王子也加入其中),最终,穆罕默德(即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年)使奥斯曼国家重获统一,奥斯曼国家的这一分裂时期被称为“大空位期”(Interregnum),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第一卷:加齐帝国,1280—1808年》,第28—39页。

③ 科林·因伯尔《奥斯曼加齐传说》(Colin Imber, “The Legend of Osman Gazi”) E. 扎卡里亚多编《奥斯曼埃米尔国(1300—1389)》(E. Zachariadou, ed., *The Ottoman Emirate 1300—1389*), 克里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SUMMARIES OF ARTICLES

Yang Dongliang , *The Authorit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Meiji Restoration is the reorganization of powe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Edo period. The threat of aggress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directly brought about the Sonnō-jōi movement , profoundly intensifie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 and severely impacted the Bakufu-daimyo system and the authority of shogunate. The game among the four forces , including the shogunate , the royal court , the daimyo , and lower samurai , started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whether opening the country or expulsing the foreigners and whether supporting the shogunate or abolishing it. In the end , an anti-shogunate alliance formed among strong feudatories , which led to the downfall of Tokugawa Shogunate in virtue of a coup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mperial rules. After a long-term political struggle among different fractions in the Meiji government ,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resettled , the centralized system was organized ,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 classes was rebuilt thoroughly. Therefore ,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modern empero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the shaping of authority figure spiritually and legally. The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uthority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were accomplish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main lines. More specially , the explicit main line was the state power reconstruction while the implicit main line was the authority based on ‘the adaption to the situation’ which restricted the power reconstruction. Eventually , the form of legislation was realized through clarifying the political approaches and ‘purifying’ the oligarchy.

Han Zhibin and Jiang Xinyu , *The ‘Ghazi Origin Theory’ and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Ottoman’s States*

The academic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Ottoman’s states. On the basis of questioning the ‘tribal origin theory’ regarding the Ottoman Empire , Wittek proposed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the ‘Ghazi origin theo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Ottoman Empire originated from a ‘Ghazi group’ in a ‘frontier society’. The early Ottoman states geographically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 an area which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the occupation. This resulted in a continuous ‘Ghazi War’ for a long period and subsequently formed an empire. Since the 1940s , the European scholars have criticized and negated the ‘Ghazi origin theory’ . Nevertheless , this theory reflects a certain dimens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s and a different aspect of propositional thought.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Bithynia had the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co-existing civilizations. The early Ottoman states which emerged in Bithynia also shar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s in Asia Minor and the Balkans. A worldwide empire across Asia and Europe eventually formed in the 15th century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s.

Gong Weiying, *The Iconoclasm and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Christendom in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The Byzantine Iconoclasm in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led to the divis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Christendom. The Eastern Church and the Western Church took different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imperial iconoclastic policy for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The Eastern Church led by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made a compromise and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Byzantine emperor, strengthening the existent social structure of Caesaropapism, while the Roman Church with its opposition to Iconoclasm formed a political alliance with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speeding up its separation from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gradually moving onto the path of dualism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The East-West relations became worsened, and the intensifying struggle for the supreme power of the Church foreshadowed the final schism between the Eastern Church and the Western Church within the Christendom.

Wang Qian, *The Legislative Sovereign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rman Territorial Stat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16th century is a crucial transition period in the German history, witnessing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legal system from the medieval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pattern, but als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These transformations cannot be realized on the imperial level due to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but were highlighted on the territorial level.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pplicable to the whole territory was required by the territorial state to replac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edieval lordship and autonomous commune, which establishes a new type of jud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subjects. In this process, the common people exerted unignorable influence by converting their grievances into the territorial laws. The territorial legislative behavior greatly promoted the German territorial state-building and reflected its inherent complexity in the 16th century. From the legal perspective, it would be proper to identify the territorial state as a semi-feudal and semi-modern pol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